

论的批判,“这种理论上的义无反顾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种实践的因素,我甚至还敢于如此极端地说,实践在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悄无声息地进入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本身已经属于对正确行为的可能性重新进行周密思考的范围”<sup>19</sup>。于是,文化的救赎也就顺理成章。人的问题总是与思想或者精神联系起来的。当人的思想有所否定、人的精神有所超越的时候,人的现实及其社会实践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文化的中介作用。

今天的“文化工业”(更流行的说法是“文化产业”)相比阿多尔诺的时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性,这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文化转向”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明。在商业化逻辑已经实现全球化的情形之下,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尽管显得有些过时和片面,尤其是他对于“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持的精英主义立场屡遭批评,但是他对于“文化工业”的操纵模式的理论分析依旧有其现实的意义。如果撇开他过于低估流行文化消费者的辨别力和抵抗力的盲视部分,他所进行的哲学式的文化批判不失为一种独立的声音。在任何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需要一种独立的声音,都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意识。

#### [注释]

<sup>1</sup> ¼ Å 11 15 T.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06, p. 160, p. 38, p. 54, p. 46.

<sup>2</sup> » Å 12 16 M. Horkheimer and T.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4, p. 4, p. 111, p. 116, p. 109, p. 106.

<sup>3</sup> ¼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M]. Glasgow: Fontana, 1976, p. 231.

<sup>4</sup> ½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Volume 1[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 1984, p. 4.

<sup>5</sup> 霍克海默尔:《霍克海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27-228页。

<sup>13 14</sup> 吕西安·马尔松:《爵士乐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7页。

<sup>17</sup>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1984, p. 343.

<sup>18</sup> Robert W. Writkin Adorno on Music[M].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32.

<sup>19</sup> 阿多尔诺:《道德哲学的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

殷旭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政部,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霸权”是葛兰西实践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葛兰西是霸权概念的独创者而不是继承者。在他提出霸权概念的过程中,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起到了特殊的思想作用。葛兰西对于文化和精神活动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的重视引导他逐步地提出了霸权概念。本文将集中分析和探究葛兰西哲学理论中有关三种类型霸权的论述:即有关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和完整霸权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完整霸权;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0)09-0011-07

霸权(Hegemony)是葛兰西文化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的基本理论点”<sup>1</sup>。葛兰西一直被公认为首先是一个“霸权理论家”,但是,这个概念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并没有被赋予一个完全固定的位置,它以零散的方式出现在葛兰西的政治著作,尤其是《狱中札记》一书中。意大利学者马斯泰罗内指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6BZX0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殷旭辉,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

<sup>1</sup> Joseph V. Fan in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

出:葛兰西关于霸权的思考是“一项未完成的政治思考”。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规定具有丰富的理论维度,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对其进行整理和系统化。

## 一、霸权概念的理论渊源

根据英国学者威廉斯的考察: Hegemony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本义是指支配他国的领袖(leader)和统治者(ruler)。而直到19世纪之后,这个词具有的政治支配——指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的意蕴才出现并使用到今天。威廉斯特别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里,尤其是在葛兰西的作品里,这个词变得非常重要”<sup>1</sup>。霸权概念的引进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它代表着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旧观念的一种彻底决裂。美国学者Femia认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缺口——上层建筑的缺口。这种缺口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独特性:由于马克思本人把他成熟时期的大多数精力都集中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文化与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关心的主要问题。而马克思之后的继承者错误的把这种倾向绝对化了,这种错误被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著名公式的标准解释所进一步加剧。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唯一的和完全的为其他领域的性质和发展负责的话,那么后者的活动可以被可靠的忽略和简化了<sup>2</sup>。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填平了这一历史缺口,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没有直接出现过霸权的概念,相关思想反映在其早期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sup>3</sup>。“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这说明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包括物质利益的斗争,而且也包括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斗争,“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即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抽象的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4</sup>。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三种斗争形式:除了政治的斗争和经济的斗争之外,还有理论的斗争。理论也可以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德国工人比欧洲其他国家工人的优越之一在于: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sup>5</sup>。马恩的上述论断对葛兰西构建霸权理论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直接受惠于列宁,“霸权这一概念是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佩里·安德森指出:霸权概念是19世纪80年代首先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由普列汉诺夫提出和使用的,基本意思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应在和其他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中起文化领导的作用<sup>6</sup>。这本质上是肯定在落后的文化状况中精英领导权的必要性的。而对这一概念进一步展开的是列宁,列宁的著作——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下文简称《策略》)和《怎么办?》——中的立论对葛兰西起到重大影响。

《策略》一文“完整的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sup>7</sup>学说”。在这篇文章中,“领导权”的概念多次出现,如“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且领导着先进阶级的

<sup>1</sup> 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45页。

<sup>2</sup> Joseph V.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7

<sup>3</sup>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诸多著作,但是没有提到这本著作,因此,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葛兰西没有看过这本书,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葛兰西在1929年3月25日给塔吉亚娜的信中写道“我想要最近出版的法文版:马克思的《哲学著作集》(由巴黎科斯塔斯出版社出版)第1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对鲍威尔及其同伴”。而在1931年6月29日给塔吉亚娜的信中葛兰西写道“我收到了3卷马克思的《哲学著作集》,译文糟糕透顶。”这证明葛兰西看到了这本书的法文版。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53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1页。

<sup>6</sup> 波寇克:《文化霸权》,田心喻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sup>7</sup> 对Hegemony这个词的翻译存在争议,主流的译法有两种:一种译法是“领导权”,另一种译法是“霸权”。列宁在《策略》中说的“领导权”就是“霸权”,当然他用的是Hegemony的俄文同义词 gegan on iya 《列宁选集》的中文译者把它翻译成领导权自有其理由,本文写作时也沿袭了这种译法。

政党所能够而且应当在历史上起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我们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还打算领导能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阶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是说,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分掌’起义的领导权”、“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等等<sup>1</sup>。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主题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无产阶级(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如何才承担一种领导或霸权的作用。因此,列宁说的霸权是一种纯粹的的工具的和策略的意义,而且列宁也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把这个词扩展到在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sup>2</sup>。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批判了“经济主义”的错误,讨论了对工人加强政治教育的问题,这是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直接来源”。列宁指出“‘经济主义’的基本倾向是: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融合起来作政治斗争”<sup>3</sup>。而单纯的经济斗争至多只能培养工人的工会意识,而不能培养工人的政治觉悟。而在列宁看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因此“我们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的紧迫性和实用性,限制了工人精神或意识形态的发展,使得工人在思想上从属于现有体系的逻辑和规范。革命意识不是工人生活经验的自然产物,要把认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任务的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充实他们。因此,列宁在《怎么办》中阐述了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意义,这已经具备了葛兰西所说的霸权的含义。

但是,列宁与葛兰西的区别是明显的:“灌输”是从外部进行的、保证方向性的行为,有强制的成分。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的“内化”作用。实际上,列宁始终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本质上是暴力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独裁”,列宁相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是固有的,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的趋势只能减轻这种无所不在的严重冲突,而不能消除冲突或者把一个充满内部斗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暴力策略始终被列宁视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法,如他在《策略》中所说“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到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强力”、“它必不可免的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sup>4</sup>。美国学者费希曼评价道:“列宁的宗教信仰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列宁的上帝,而列宁则是暴力革命的圣徒”<sup>5</sup>。葛兰西用法中的关键词“文化”在列宁的革命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因此,葛兰西是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自己的霸权概念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葛兰西是把列宁的作品作为澄清本身特殊思想的一种工具来使用的。因此,葛兰西是霸权理论的独创者而不是继承者。

## 二、葛兰西的文化思想和霸权理论

葛兰西一生都深受克罗齐哲学的影响,他的妹妹泰蕾西娜回忆当年帮葛兰西作剪报时,葛兰西要求她把克罗齐的文章放在最前头<sup>6</sup>,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葛兰西:“他是克罗齐主义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克罗齐主义者”。由于受到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的训练,葛兰西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在改造社会和人

<sup>1</sup> 以上论述分别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5页、538、543页等。

<sup>2</sup> Joseph V. Fan *La Gran sciá politica I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

<sup>3</sup> 在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中,葛兰西承认“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式。这一切,意义是明确的:统治(强制)是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所必要的,而领导权则是保障以广泛赞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方法”。葛兰西在这封信中指的是列宁的《怎么办》一文。

<sup>4</sup>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6页。本段的其他引文分别见第226、241、272、285页。

<sup>5</sup>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23页、547页等。

<sup>6</sup> 费希尔:《列宁传(下)》,彭卓吾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497页。

<sup>7</sup> 费奥里:《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性中的作用,“革命可以在思想领域内发生,解放可以通过哲学而获得”,这种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论调一度占据了葛兰西的头脑。葛兰西曾经认真地考虑把教师作为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因为在他看来必须用文化教育来提高意大利民众的道德和知识水平,在业余时间他经常到工人中去进行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在葛兰西看来:必须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文化,否则无产阶级永远也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作用。对文化和精神活动的高度重视使得葛兰西被称为“文化派”<sup>1</sup>。

集中体现葛兰西文化思想的是 1916年初发表《社会主义和文化》一文。在文章的开头,葛兰西引用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来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问题是赢得一个人先验的自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如果对其他人缺乏预感或完全理解,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而如果我们对于自己都缺乏充分理解的话,那就绝无希望能真正理解其他人”<sup>2</sup>;另一段话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对“认识你自己”的解释:这句话来源于古希腊政治家梭伦,而苏格拉底后来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哲学之中。在维科看来:梭伦是希望用这句格言来告诫那些相信自己起源于兽类、而贵族则起源于神的平民们,要他们反省自己并看到他们有着和贵族同样的人性,因而应当宣称他们在民法面前是平等的。在葛兰西看来:这两段话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文化的重大问题。在流行的实证主义的观念支配下,文化被看作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人被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等于知识的堆积。葛兰西指出:“文化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修养,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对于人而言,这些东西不可能像动物或植物那样自发的产生,而是要依赖于人的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葛兰西认为:“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人类是逐渐的、在一定阶段上才意识到它自身的价值,并且赢得这样一种权利去抛弃掉由少数人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强加于它的那些组织形式。这种意识不是由于生理需要的残忍刺激形成的,而是对于为什么存在着某些条件和如何最稳妥地去把居于附属地位的事实转变成为起义和社会重建的导火线这一问题作出明智判断的结果,开始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一个阶级都有这样的明智的判断。这意味着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葛兰西以启蒙运动为例子,指出它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精神准备的文化因素。意大利文学家德桑克蒂斯在《意大利文学史》一书中也提到: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宏伟的革命,它以一种统一的意识的形式,给欧洲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精神国际。伏尔泰的每一部喜剧和小册子都像星星之火一样越出法国的国境线而向欧洲传播,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的封建制度时,他发现从 18 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涌出的书籍和小册子已经提前做了类似的工作,这就是文化在改造社会和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葛兰西在文章结尾郑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意实现社会主义?在当前的条件下,首先要进行文化批判工作,只有通过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产阶级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文化活动与革命行动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葛兰西对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视,逐渐引导他提出了霸权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之后,霸权概念开始出现在葛兰西的政论文章中。根据笔者的考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918年 7月 27日发表在《人民呼声》上的文章《俄国的乌托邦》,这是葛兰西评论俄国革命的系列文章之一。俄国革命的成功对葛兰西的思想触动极大,为什么革命首先发生在一个像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而且取得了胜利呢?而且革命发展的非常迅速,几乎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sup>3</sup>。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事件,对该事件的思考贯穿了葛兰西

<sup>1</sup> 在 1912年 9月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葛兰西大学同学和好友塔斯卡与波尔迪加就“青年的文化和教育”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后者认为“谁都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他们所属的该阶级强制的那些现实生活的必然性而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塔斯卡则强调,迫切需要的是文化更新和从认识上使意大利恢复生机。波尔迪加把塔斯卡和他的支持者们称为“文化派”。虽然葛兰西当时还没有加入社会党(直到 1913年末才加入),但他的思想倾向与塔斯卡是一致的。

<sup>2</sup>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 10. 本段其他论述分别见第 11、12、13页。

<sup>3</sup> 研究者普遍认为:霸权概念最早出现于《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方面》中,这是葛兰西在 1926年 11月被捕之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是一个误解。

<sup>4</sup> 据前苏联官方的宣传,列宁领导赤卫队、士兵和民众包围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并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而根据苏联解体之后研究资料表明,当晚在冬宫附近并未发生武装冲突,守卫冬宫的仅有一个妇女营和一个士官生营,在人群的冲击之下很快就投降了。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自己打开了冬宫大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而阿芙乐尔巡洋舰正在大修,没有装弹也没有人员。被临时任命的阿芙乐尔号的政委别雷舍夫仅仅向冬宫打了几发空弹(没有弹头)。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的后半生。在葛兰西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前对工人和士兵的政治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评价俄国革命的文章中,葛兰西引进了霸权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进行了反省:“前提(经济结构)和结果(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也不完全是通过经济事实用文件来证明的。阐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历史不是数学计算,……数量(经济结构)转化为质量是因为它是人手中的一种行动工具。人的价值不应该仅仅按照他们的体重和身高,从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所产生的物理能量上来看,也要从他们具有头脑,他们能受苦、推理、高兴、期望和拒绝这一事实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未知的、变化的‘人性’要比任何其他事件中的情况更加神秘。”<sup>1</sup>因此,要研究“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和其他一般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直接决定政治行动的并不是经济结构,……事件取决于极为众多的人民的愿望,这些愿望通过他们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通过他们相应的理智态度表现出来。事件还取决于少数人所掌握的跟这些愿望有关的知识,取决于少数人把这些愿望体现于国家权力之中以后,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引向一个公共的目标”,而列宁及其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少数人”,他们发动和组织了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具体的阶级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能向人民指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用这种力量建立长期的合法政权的意志。葛兰西最后写道:“资产阶级力图确立自己的霸权(hegemony),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sup>2</sup>。葛兰西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建立霸权的问题,并且已经隐含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争夺霸权的斗争。

在这之后,霸权概念不时出现在葛兰西入狱前撰写的很多政论文中。比如,在1919年7月12日发表的《夺取国家》一文中,葛兰西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竞争的最高阶段规定为“夺取政权,即夺取社会霸权(leadership)和统治权的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sup>3</sup>;在1919年7月26日发表的《关于共产国际》一文中,葛兰西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集团在战后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的有效工具”;在1920年3月26日发表的《力量的问题》一文中,葛兰西写道:“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北方、意大利北方的工业中心有它最深厚的基础,也有它霸权(hegemony)的活动所在”;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红色星期日》一文中,葛兰西说:工人阶级通过占领工厂,使得他们由“执行的”阶级、“充当工具的”阶级变为“监督的”阶级,葛兰西写道:这表明“无产阶级取得了支配自己的霸权(leadership)”<sup>4</sup>;在1920年10月19日发表的《预言》一文中,葛兰西指出“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统治和霸权阶级出现在群众意识和政府机构的政治现实中”;而在1926年10月,即葛兰西入狱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方面》中,葛兰西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霸权’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的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霸权和统治的阶级”<sup>5</sup>。在文中,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而这也就是霸权的“同意”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霸权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但是葛兰西没有对它进行系统论述,这项工作是在他入狱之后才开始进行的:葛兰西在1926年11月的被捕,对于他个人而言是灾难的开始,但也正是在法西斯监狱的十年岁月中,霸权作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才建立起来,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 三、三种类型的霸权

《狱中札记》<sup>6</sup>被誉为“对知识分子的坚韧性和英雄主义的一座纪念碑”。在《札记》中,葛兰西进一步提炼和发展了他前期思想中的霸权概念,并把它作为重构其全部思想的中心线索。根据笔者考察:在《札记》中,葛兰西至少使用了三种类型的霸权概念:

<sup>1</sup>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 48.

<sup>2</sup> Ibid., p. 53.

<sup>3</sup> Ibid., p. 74. 本段的其他引文分别见第 81、179、340、356 页。

<sup>4</sup> 《葛兰西文选》,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229 页。

<sup>5</sup> 为了方便起见,下文一律简称《札记》。下引此书文献,将在文中直接夹注。

第一种类型的霸权是指政治霸权。在《札记》中葛兰西多次直接使用了这个词,如“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政治霸权问题”等。政治霸权强调的是国家统治的暴力层面,实质上就是狭义意义上的“统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一贯认识。马克思强调国家的暴力性质,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压迫与统治的机器,国家政权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越来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sup>1</sup>;恩格斯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新手段”<sup>2</sup>;列宁始终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本质上是暴力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sup>3</sup>,资产阶级民主是对“无产阶级的独裁”,在列宁那里,霸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葛兰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在一篇题为“国家”的札记中,葛兰西指出有两种形式的国家:一是现存的阶级国家,二是马克思设想的在未来才能实现的“治理有方的社会”(即共产主义)。在现有的国家形式中,“国家的基础是狭义的政府强制机构”(P220),“国家机关代表司法治理的强制和惩罚力量”(P223),“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P214)、“三种权力都是政治霸权的工具:其中立法第一,司法次之,执法最次”(P202)等。这意味着政治统治仍然是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当然,葛兰西认为:在共产主义学说中,“人们必须经过国家等于政府、国家等于市民社会的阶段,最后达到国家等于守夜人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家成为强制性的组织”,而“随着治理有方的社会的各种要素变的越来越明显,国家的强制因素会逐渐消失”(P218)。这说明:当国家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它采取暴力的手段来监控社会,但是当国家进入到市民社会阶段的时候,它就具有了伦理教育的功能,“国家的职能在总体上发生了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P216),“政治霸权仅仅成为统治职能的一部分”(P39),第二种类型的霸权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

第二种类型的霸权是指文化霸权。文化霸权在葛兰西霸权理论中最具有原创性意义,在《札记》中当葛兰西谈到霸权时指的就是文化霸权。我国台湾省的学者把霸权直接翻译成文化霸权,其意图就是用文化这个定语来指明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本质含义。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知识和道德的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暴力来制服的社会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P38)。这是葛兰西全部研究工作所依据的“方法论标准”。文化霸权的概念说明:一个经济阶级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宰制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和物质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凝结为文化上的优势,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在现代世界,社会控制可以采取两种基本的形式,除了从外部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之外,还可以从内部影响他们,塑造他们相信某种主流的价值标准。在葛兰西看来:第二种方式是更重要的统治方式,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文化霸权是以通过教育等方法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为特征,或者说霸权就是经过“同意”的统治。但是什么是同意?人们为什么要同意呢?美国学者 Femia 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同意<sup>4</sup>:第一种是“被迫”的同意:某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害怕不同意而带来的后果——也许会导致惩罚性的剥夺或伤害,也可能包括名誉或自尊的丧失;第二种是“无意识的同意”:某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在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时用某些方式习惯性的寻求目标,因此,固定于某些行为模式的人不是因为他自觉的尊重它们而是因为他很少遇到拒绝或更正的状况。在这种意义上,同意是一种麻木的参与固定行为的方式。而葛兰西所说的“同意”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来自于某种程度的有意识的依附于社会的核心要素,这种同意不一定与看得到物质利益有关,但是肯定与对同意的要求或多或少的确证和正确的信仰有关。

葛兰西是从文化和思想特点上分析“同意”概念的。葛兰西指出:“被统治者的历史特征”是“自发性”:

<sup>1</sup>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3页。

<sup>2</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8页。

<sup>3</sup> 列宁:《国家和革命》,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sup>4</sup> Joseph V.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6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意识上受压制和依附于统治阶级,“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历史可能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也没有想到为自己的历史留下文件佐证会有任何价值”(P159)。列宁在《怎么办》中就认为:“关于自发性有很多讨论,但是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就恰恰使得它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sup>1</sup>。这意味着工人落入了资产阶级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葛兰西指出:“所谓自发,是指他们不是产生于已经觉悟的领导集团进行的有系统的教育活动,而是受到常识,也就是普遍的传统世界观启发的日常经验支配”(P161)。但是,“每一次自发运动都具有觉悟霸权的和纪律的起码要素”(P159),通过知识分子和政党的教育活动可以使得群众从“常识”上升为“健全的见识”,“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消除不良的外部影响,通过生动而具有历史效果的手段使它向现代理论看齐”(P160)。因此,群众的自发感情与“现代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而实现这种转换的中介就是知识分子和政党进行的文化霸权。葛兰西也把它叫做“知识和道德改革”,这种说法是法国哲学家勒南在评价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用的一个说法。葛兰西借用这个说法是要求在意大利也要来一场与宗教改革的具有同样规模并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同等性质的文化革命和道德伦理改革。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断言:法国革命的公式可以转换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原理,而对被统治者进行的“知识和道德改革”也可以使得他们获得有意识的霸权,唤醒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为执掌政权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

第三种类型的霸权是“完整的霸权”(P285)。这是前两种类型霸权的综合和统一。强制和同意的两分法是从马基雅维利到帕累托的意大利政治思想的特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法律和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诡秘的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且在他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sup>2</sup>。葛兰西受到马基雅维利这种说法的启发,他认为这种半人半兽的比喻体现了政治活动中强制和同意、统治和霸权的统一。葛兰西指出:“国家不仅是统治阶级宣扬和维护统治,而且是成功的获得被统治者同意的所有复杂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总和”(P200),“国家是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P218),是强制和同意这两个环节的辩证统一。葛兰西引用了克罗齐的“伦理国家”的说法并且对它进行了理论改造:“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现实中大批其他所谓的私人的创造性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了统治阶级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手段。”(P214)

葛兰西认为:霸权已经成为后封建社会的正常社会控制形式。这并不是说政治霸权(暴力)在现代世界已经不被采用了。但是,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特殊危机时期才被求助。在大多数时候,霸权比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更常运用并且占优势。葛兰西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且使得它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取代他们以前的观念,从而获得他们最广泛的同意和支持。这是一个社会集团实现政治霸权的前提条件,但是即使在获得政权之后,也要继续维持这种同意和支持。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同时又是领导阶级。“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的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霸权。”(P38)

综上所述,霸权概念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具有多种维度,但是其中最核心和具有原创意义的是文化霸权。葛兰西抓住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文化,并且把它作为霸权概念的中心线索,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在葛兰西之后,霸权的概念被阿尔都塞和威廉斯等人继承和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重要理论来源。

<sup>1</sup>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256页。

<sup>2</sup>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3页。